

试析中国维和观念的演变

〔新西兰〕马克·兰泰尼

内容提要 与冷战期间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谨慎政策有明显不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在维和行动中同时部署民事和军事人员到指定地区,反映了中国维和行动的观念发生变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既是中国跨区域外交的一部分,又是中国人道主义干预等“非战争性军事行动”的安全政策体现。目前,中国的维和人员前往的多为和平脆弱地区,维和人员面临当地武装分子的严重威胁。中国正试图在成为国际安全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和参与联合国解决国内冲突的维和行动间寻求利益平衡。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联合国维和行动 维和观念 维和政策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成为中国广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历史契机,中国对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立场态度明显转变。从近期中国对内部冲突和崩溃国家的干预、处理战争向和平的过渡(war-to-

* 〔新西兰〕马克·兰泰尼(Marc Lanteigne),新西兰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防御与安全研究中心高级讲师。

peace transition)问题,以及关于维和行动具体实践等相关的一系列政策中,都能体现中国对维和这一概念理解的转变。30多年来,通过运用广泛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从谨慎、不参与,逐步发展为越发地关注和更深入地介入。冷战结束以来,各种形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显现,这其中包括崩溃国家、低烈度冲突,以及全球性恐怖主义和经济不安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开始更加重视通过多边合作来应对全球性的安全威胁。

由于担心被视为国际秩序的修正者,从总体上讲,中国过去不愿意参与维和行动及其决策,而现在,特别是针对众多安全问题中的国内冲突议题,中国试图塑造自身身份,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重要伙伴而非搅局者。尽管中国正在积极地推动维和事业,但当中国的“蓝盔部队”执行更为复杂和危险任务时,中国政府仍将面临一些决策上的难题。

本文回顾了中国针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策变化历史,以及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一批人员部署情况。通过对一系列中国和其他地方政策文件的解读,尝试解释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如何体现出中国的安全政策,特别是针对人道援助、和平过渡、维持治安等非军事议题的改革变化。此外,本文解释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与发展中国家通过“一带一路”等进行贸易倡议间的一致性。最后,针对中国维和人员参与马里、苏丹等不稳定地区的维和行动,指出中国政府可能面临的挑战,以及回答维和行动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外交和战略利益中将如何发挥作用。

一、中国针对维和行动的观念变化: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

随着中国对自身崛起的自信及对亚太区域外介入能力的提高,中国对维和行动态度和政策也开始发生改变。中国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但也面临更多国际上的压力,因为国际社会认为,在发生冲突的地区,中国表现的应该更积极。因此,在对待维和行动上,中国进行更为细致入微的观察,特别参加一国有内部冲突的维和任务时,中国将区别采用积极举措或消极举措,

并时而提出有别于西方的政策选择。^① 但是,中国的这些想法和举措是以获取更多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战略等方面一手信息为前提的。在很多时候,中国与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很少联系,比如在中东地区。在这一地区,伊拉克和叙利亚正在遭受内战,同时,还面临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威胁。^② 中国关于维和及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政策战略意图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是问题解决者,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多边合作者,而不是一个霸权国家。

联合国一向是展示中国关于“筑造和平”态度变化的前沿阵地。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包括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的一些非传统维和行动。^③ 中国曾一度没有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但从 1982 年开始,中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支付摊款。1989 年,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对话,同年,中国首次同意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非军事观察员,特别是派遣观察员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UNTAG)。1990 年 4 月,中国同意派遣五名军事观察员到中东协助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TSO)的任务。^④ 自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以来,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更偏向派遣军事观察人员,唯一例外是 1992-1993 年间,中国参与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的维和任务,当时,中国先后派遣两支工兵营前往柬埔寨,这也是中国的行动首次被冠以“蓝盔”的

^① Miwa Hirono and Marc Lanteigne, “Introduction: China and UN Peacekeeping,” in Marc Lanteigne and Miwa Hirono, *China's Evolving Approach to Peacekeeping*,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1-14.

^② Qi Dapeng, “Historic Challen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China's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ategy: A Over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ecurity Situation an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 2015,” 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hina), ed.,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World at the Crossroad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7, pp. 9-15; “Bloody Islamic State Video Puts China in Cross Hai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Agence France-Presse*, March 2017,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075183/bloody-islamic-state-video-puts-china-cross-hairs>, 2017-06-17.

^③ M. Taylor Fravel,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1989,” *Asian Survey*, Vol.36, No.11, November 1996, pp. 1103-1104; Pang Zhongying, “China's Changing Attitude to UN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12, No.1, Spring 2005, pp. 87-104.

^④ Zhang Qingmin, *Contemporary China's Diplomacy*, Beijing: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14, pp. 71-76; Jing Chen, “Explaining the Change in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A Norm Chang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8, No.58, pp. 157-173; “China's 25-year Engagement in Overseas Peacekeeping Missions,” *Xinhua*, August 1, 2015, http://english.chinamil.com.cn/news-channels/china-military-news/2015-08/01/content_6610676.htm, 2017-06-18.

名义。^①

世纪之交,中国开始同意向维和任务派遣民事警察部队作为联络人,如1999—2002年联合国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②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参与更多的维和行动,其中包括在海地的维和行动,虽然海地与中国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2010年1月,海地发生地震,中国有八名民事维和警察及人员罹难,这些遇难人员被授予“烈士”荣誉称号。^③参与海地的维和任务是中国关于维和行动决策的一次重要转变,之前中国对在与中国无外交关系国家的维和行动非常谨慎。例如,中国在1997年和1999年针对危地马拉和马其顿的维和决议投反对票,因为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承认台湾的主权地位。^④中国的维和人员还被派到科特迪瓦、塞浦路斯、马里、苏丹、南苏丹和西撒哈拉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2016年12月,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小军少将担任联合国西撒哈拉特派部队(MINURSO)司令,该任务自1991年开始实施。^⑤

2016年12月,中国政府发表的《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指出,截至2016年,中国已向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队、警察及民事人员达3.3万人次。^⑥至2017年6月,中国派往在外执行维和任务的人员约为2515人,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人员最多的国家。约有1060名官兵被派往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UNMISS)。自2011年中旬起,该特派团试

① Jianwei Wang, “Managing Conflict: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in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China Views the World*, Lanham and Boulder: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9, pp. 78-79.

②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1990—2008),”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January 21, 2009, <http://www.china-un.org/eng/zt/wh/t534321.htm>, 2017-06-18.

③ Czeslaw Tubilewicz, “The Politics of Compassion: Examining a Divided China’s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Hai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2, No.3, 2012, pp. 449-481; “Bodies of Chinese Peacekeeping Police Killed in Haiti Earthquake Arrive Home,” *Xinhua*, January 19, 2010,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0-01/19/c_13142268.htm, 2017-06-18.

④ Wei Liu,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Hackensack, NJ: World Century, 2014, pp. 93-95.

⑤ “Secretary-General Appoints Major General Wang Xiaojun of China Force Commander, United Nations Mission for Referendum in Western Sahara,” *United Nations*, 8 December 2016, <https://www.un.org/press/en/2016/sga1689.doc.htm>, 2017-06-18.

⑥ “Full Text: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China’s Philosophy, Practice and Contribution (December 2016),”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ember 1, 2016, http://english.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6/12/01/content_281475505407672.htm, 2017-06-18.

图稳定这个新成立的非洲国家的局势,同时,还要面临正在进行中的国内冲突和即将发生的大面积饥荒。^①

随着中国安全利益的不断扩大,中国开始强调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已成为中国在安全合作的重要部分。2015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军队将继续“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履行安理会授权,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促进发展和重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② 中国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不仅可以使中国获得发生在亚太之外地区的危机和安全威胁的必要信息,还将有益于中国制定关于非传统安全、战争向和平过渡、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等领域的一系列战略政策。^③

二、理解中国的维和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政府开始主动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尤其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而在冷战时期,中国时常被周边邻国和美国视为军事和意识形态对手。例如,1992—1993年,中国参加柬埔寨维和行动,以及1999—2002年参加东帝汶维和行动。在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接受中国作为一个维和的参与者,这其中包括以维和行动为平台塑造中国的软实力。^④当时,在关于参与维和事务时的角色定位上,中国仍将自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世界大国。然而,习近平主席继任后,这一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在胡锦涛政府时期,中国经济经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外交实力在亚洲乃至全球得到显著提升。中国更愿意将自身发展描述为“和平崛起”或是“和平发展”,从而有别于传统的世界大国。同样,在此期间,中国提出“和

^① “Famine Used as a Weapon of War in South Sudan,” *France 24*, May 29, 2017, <http://www.france24.com/en/20170529-focus-south-sudan-famine-weapon-war-bentiu-refugee-camp-malnutrition-children>, 2017-06-18.

^② “Full Text: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China Daily*, May 26, 2015,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5-05/26/content_20820628_7.htm, 2017-06-18.

^③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Peacekeeping Role: Its Significa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IPRI Policy Brief*, February 2009, p. 4; M. Taylor Fravel, “Economic Growth, Regime Insecurity, and Military Strategy: Explaining the Rise of Noncombat Operations in China,” *Asian Security*, Vol.7, No.3, 2011, p. 177.

^④ Li Mingjiang, “China Debates Soft Powe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2, No.2, 2008, pp. 287-308.

谐世界”的构想,更多关注通过多边合作来解决全球危机。^①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机制是实现这些理念的有效途径。

20世纪90年代,虽然软实力的理念开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中流行起来,约十年后,该理念在中国的决策圈中才得以崭露。中国政府偶尔会将软实力视为与硬实力一样,是竞争力的来源和对外战略政策的组成要素。胡锦涛主席首先在一些官方讲话中提及软实力,他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②不同于以往世界大国的崛起过程,崛起中的中国处在信息、组织与机制连接密切程度都前所未有的国际体系中。因此,中国在将自身与最近崛起大国进行比较时,对自身身份和形象更为敏感。中国认为,通过积极地参与包括建设和平在内的安全合作,将有助于抵消国际社会将中国视为体系修正者的看法。

当中国的政策决定者对“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在其决策圈中进行广泛讨论时,软实力的重要性也超越文化层面。政界和学界讨论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水平时,特别是在中美实力对比问题上,软实力成为这些激烈讨论中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例如,在关于中国发展综合国力的研究中,阎学通指出,在对比中美两国关系的综合实力时,即使加入软实力这一考量因素,相对于美国,中国仍处于劣势地位。^③胡锦涛主席执政期间,人们很明显地能够感觉到,在对外政策和国际机制的态度上,中国越发重视遵守国际法(包括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相关协议),把这当成改善中国综合国力不足的一种方式。中国与包括东亚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是对中国提高其软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考验。中国提高自身地位的努力包括调整多项政策,这其中包括发展出一种更为巧妙和精细的维和手段。

^① Marc Lanteign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39-40.

^②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06年11月10日,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5026372.html>, 2017-06-18。

^③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Power Statu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1, 2006, p. 21; 阎学通:《中国软实力有待提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2006年, <http://www.ccwe.org.cn/ccweold/journal/2/1.pdf>, 2017-06-18。

世纪之交,中国在对外政策整体发展框架内开始关于软实力的争论,当时,中国政府认为,仍有必要坚持邓小平时代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保持低调的原则。^①争论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符合中国日益崛起的国际地位。在江泽民时期,中国已经开始拓宽其外交利益,邓小平时期的关于中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坚持不当头的保守姿态即“韬光养晦”政策,似乎开始显得不合时宜。^②如今,中国正在从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成为一个崛起大国。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谈到,中国支持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坚持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重视加强国际军事交流,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③

中国在发展维和政策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角色,以便适应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在江泽民时期,中国所推崇的军事战略为“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而胡锦涛时期则认为,中国军队应该准备迎接“新的历史使命”,其中包括维和行动、多元化的军事任务,以及海外军事任务。中国正在努力消除“中国威胁”的国际形象,并积极推动包括联合训练、军演在内的军事外交活动。^④胡锦涛执政期间,对“保护的责任”理念也给予极大关注。“保护的责任”意味着有必要对一些国家内部的危机,包括一国内的人道主义危机,及时做出反应。起初,中国的政策圈中对“保护的责任”理念存在顾虑,认为这会有时破坏一国的主权,尤其是在处理处于崩溃边缘国家的时候。^⑤然而,在过去十年间,基于许多国内冲突已经变成地区冲突或者带来国际层面的负面影响,中国改变了对“保护的责任”的看法,并开始加入到维和任务当中,其中包括在马里和南苏丹的维和,这两个维和任务都涉及对一国内部危机的

① Li Mingjiang, “China Debates Soft Powe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une 2, 2008, p. 294.

② Sujian Guo, *Chinese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Power,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286.

③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Beijing, 2011.

④ Roger Cliff, *China’s Military Power: Assessing Current and Future Capabil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9-30; Eric Hagt, “The Rise of PLA Diplomacy,”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20-221.

⑤ Zheng Chen, “China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5, No.101, 2016, pp. 686-700.

处理。

对达成上述两个目标,维和行动的相关培训和实践日益重要。2001年,中国国防部成立维和事务办公室,^①向中国派遣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提供培训和训练设施;2000年8月,中国政府在河北廊坊成立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培训中心;2009年6月,北京怀柔区设立国防部维和中心。这些机构为一些专项任务提供专项训练和培训设施。^②

自习近平主席2012年任职以来,中国关于地区和国际安全的观念有了进一步变化,一种对自身能力的更加自信态度,以及更为积极的对外政策。^③中国开始逐渐从“低调”的对外政策转为更有意愿介入到包括安全事务在内的国际议题中。回应20世纪提出的“美国梦”,习近平主席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即提出“中国梦”,这表明中国意图重返世界大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④在关于中国战略意图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宣扬一种“总体的”和“共同的”安全观,同时强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坚持多边对话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在2013—2014年期间,习主席同样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基于陆海两条贸易路线,其中陆地路线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到欧洲地区;海上则通过印度洋到达非洲大陆,涵盖了中东和南亚地区,意图实现陆地和海洋的互联互通。尽管“一带一路”通常被理解为是经济发展倡议,但不能忽略在该倡议实施发展过程中,也潜藏着一些安全风险,例如恐怖主义和一些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⑤

对“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主要来源于两个财政机构。这两个机构都用扩大对中国亚洲邻国的经济支持。2014年,中国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

^① Dennis J. Blasko, *The Chinese Army Today*, pp. 220-221; “UN Official Commends China’s Role in Peacekeeping,” *Xinhua*, November 17, 2007.

^② Marc Lanteigne, “Red and Blue: China’s Evolving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Policies and Soft Power Deployment,” in Chiyuki Aoi Yee-Kuang Heng, *Asia-Pacific N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eace Support and Stability Oper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130.

^③ Angela Poh and Mingjiang Li, “A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Rhetoric and Substance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Asian Security*, Vol.13, No.2, 2017, pp. 84-97.

^④ Zheng Wang, “The Chinese Dream: Concept and Contex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No.1, 2014, pp. 1-13.

^⑤ Wang Yiwei,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at China Will Offer the World in Its Rise*,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2016, pp. 88-98.

基金,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提供投资支持。随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宣告成立。2017年初,有52位来自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创始成员国(之后又有20多位新成员加入),这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创设的具有替代性的借贷机构。^①由中国牵头的两个重要金融机构的创设,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助力,为中国的邻国发展提供动力。新机制将与原有的金融机制,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同为全球发展提供潜在的资金支持。^②中国创立这些金融机制仍体现中国一向主张的发展促进地区安全的理念,并且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仍坚持传统原则,即不干涉他国内政。

即便“一带一路”倡议及其相关机制关注的是经济问题,然而,很显然这也会带来政治影响。这些政策会帮助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国,一个在东亚和临近地区施加结构性权力的大国。这些新兴机制不仅会影响中国的权力投射,还会影响中国应对国内冲突、战争向和平过渡的相关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借由维和任务实施。除“一带一路”倡议和相关机制中的经济因素外,为实现这些更富雄心的安全目标,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还必须涉足区域、次区域内的安全与和平建设问题和危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中国更深入地解亚太地区之外的安全问题,还有潜在的建设和平议题。中国对联合国维和倡议所展现的日益增长兴趣与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经济外交之间势必存在广泛的利益关系。

中国宣布在吉布提首次建立的海外军事设施是证明这种利益关系的典型案例。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美国和法国之前即已在此部署军事设施。^③虽然吉布提资源稀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微乎其微,但基于靠近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地缘考量,吉布提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解决索马里附近海盗劫掠民用船只的问题,中国海军于2009年开始在亚丁湾附近参与打击海盗的多边行动。由于在该地区缺乏补给港口,中国船只在该地区的行动遭遇很大阻

① Asia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Bank, <https://www.aiib.org/en/index.html>, 2017-06-18.

② James Kyngé, “AIIB Chief Unveils Aim to Rival Lenders Such as ADB and World Bank,” *Financial Times*, May 4, 2017.

③ Jeremy Page, “China Builds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Outpos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9, 2016.

碍。^①对在吉布提的基础设施,中国军队谨慎地将它们界定为“支援设施”,而不是军事基地,这些设施将被用于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队在印度洋地区的航行。^②由于水路航线对许多“一带一路”的路线来说非常重要,吉布提的例子显示中国如何将安全利益与跨区域外交之间实现对接。此外,鉴于中国在非洲地区执行一些维和任务,例如在刚果、利比里亚、马里、苏丹和南苏丹,吉布提的设施可以在现在和未来成为中国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协调中心。^③

三、中国维和政策面临的挑战

包括亚洲和美国在内的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战略走向,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正是在世界的关注下发展和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全方位崛起并未能减轻国际社会存在的“中国威胁”的顾虑。因此,中国正尝试通过各种手段推动其安全政策,同时,也要避免给国际社会留下正在直接挑战国际秩序的形象。对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首先,中国的崛起体现在战略和经济两个层面,并且两个层面的“崛起”都十分迅速,吸引了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中国与东盟成员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地区海洋主权的争端问题,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会成为在东南亚安全领域的独断者和修正者这一可能性的顾虑。^④类似问题还包括中国与日本关于东海的划界问题,特别是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中日两国都声称钓鱼岛是其历史上固有的领土。^⑤尽管中国一向试图展示自己是主张维持地

^① Marc Lanteigne, “Fire Over Water: China’s Naval Modernisation and the Anti-Piracy Operations,” *Pacific Review*, Vol.26, No.3, 2013, pp. 289-312.

^② “Defense Ministry’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Feb. 25,”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25, 2016, http://eng.mod.gov.cn/Press/2016-02/25/content_4644801.htm, 2017-02-18.

^③ Laura Zhou, “Djibouti is on China’s Ma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18, 2017.

^④ Mark J. Valencia, “Military Activities in Foreign EEZs: An Update,” in Shicun Wu, Mark Valencia, and Nong Hong,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Surrey, UK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5, pp. 33-63; Katherine Morton, “China’s Ambi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Legitimate Maritime Order Possibl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2, No.4, July 2016, pp. 909-940.

^⑤ Paul O’Shea, “How Economic, Strategic, and Domestic Factors Shape Patterns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East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55, No.3, May/June 2015, pp. 548-571.

区安全问题的现状,近些年来,这些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领土争端正在不断挑战中国塑造的“现状稳定者”这一形象。

其次,在胡锦涛和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军费开支经历大幅度增长,即便相较美国仍有很大差距,但中国的军事投送能力,特别是在海洋领域,已经达到大国水平。2016年3月,尽管全球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递减,中国经济出现疲软态势,但中国的军费预算仍达到10.2亿人民币,约为美国国防支出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精简军队结构,2015年,中国宣布裁军30万人。^①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维和任务的承诺,一方面,将增强中国军队参与多边行动和军队交流的经验;另一方面,将有助于削弱中国的军费扩张是修正主义倾向的顾虑。

最后,就如何应对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后提出的“亚太再平衡”和“重返亚太战略”方面,中国的决策圈中仍存在争议。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包括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同盟和伙伴的双边关系,其中包括与同盟(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及地区伙伴(新西兰、新加坡和越南)的关系。而这已经会引发中国的顾虑,认为美国越发公然地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②虽然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奥巴马时代的“再平衡”政策并未得到延续,然而,目前美国新的亚太战略尚未清晰,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特别是在2017年初中美两国都试图解决朝鲜安全问题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关系是否会产生重大变化仍未可知。^③鉴于此,在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情况下,当中国既要增强其在国际上的军事实力,又想扩大其外交能力时,最显而易见的手段即是通过和平行动方式来实现目标,这既包括联合国框架下的和平行动,也包括其他形式的多边安全

^① Tom Mitchell, “China Military Budget Hit by Economic Slowdown, Says Xi Jinping,” *Financial Times*, May 25, 2016; Michael Martina and Philip Wen, “China’s 2017 Defense Budget Rise to Slow Again,” *Reuters*, March 4, 2017,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parliament-defence-idUSKBN16B043>, 2017-04-18.

^② Nina Silove, “The Pivot Before the Pivot: US Strategy to Preserve the Power Balance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0, No.4, Spring 2016, pp. 45-88; Kurt M. Campbell, *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China* New York, NY: Hachette, 2016, pp. 11-32.

^③ Thitinan Pongsudhirak, “Trump Promotes a ‘Pivot in Asia’,” *Nikkei Asian Review*, May 10, 2017, <http://asia.nikkei.com/Viewpoints/Thitinan-Pongsudhirak/Trump-promotes-a-pivot-in-Asia>, 2017-05-15; Benjamin Lee, “Trump’s First 100 Days in Asia,” *The Diplomat*, April 28, 2017, <http://thediplomat.com/2017/04/trumps-first-100-days-in-asia/>, 2017-05-15.

合作。

中国积极参与维和行动,一方面,可被视为是发展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是一个“国际上已经社会化的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① 借助“负责任的大国”理念来阐述中国参与筑造和平及维持和平的行为,中国想进一步通过自身话语来定义中国的角色。中国想让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国想要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但并没有必要完全依赖西方的对外政策模式;中国认为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不应仅存在一种西方式的维和行动;中国要证明其崛起不同于传统大国,而是在尊重主权原则下实现崛起。^② 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积极参与维持和平行动,中国在其中的参与已经表明,中国能够制定出更为有效政策推动其走出周边地区,前往其他域外国家和地区开展行动。

21世纪以来,中国一向公开支持通过和平方式、最好通过多边手段、借助武力而不是动用战争来解决争端。中国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成功地发展了自身的软实力,对维和任务有很大推动作用。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即便发展迅速,中国始终以中等国家身份而不是大国身份,来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在东亚地区,中等国家通常被认为更务实、更公正,以及很少以意识形态为导向。^③ 中国没有对他国进行殖民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一部分领土沦为殖民地,遭遇“百年国耻”,^④而这段记忆成为中国在思考地区安全事务时的重要影响因素。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在制定维和政策时,一个重要考量是中国要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和平建设者”的形象,作为一个了解在国内冲突中落后与安全存在必然联系的“和平建设者”。^⑤ 此外,中国在毛泽东

① 郭树勇:《新国际主义与软实力外交》,《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51页; Joel Wuthnow,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in China’s Strategic Discourse,” *Issues and Studies*, Vol.44, No.2, June 2008, p. 20.

② Courtney J. Richardson, “A Responsible Power? China and the UN Peacekeeping Regime,” in Marc Lanteigne and Miwa Hirono, *China’s Evolving Approach to Peacekeeping*,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44-55.

③ “Middle Power,” in David Capie and Paul Evans,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2nd ed.),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07, pp. 155-158.

④ Zheng Wang,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63-202.

⑤ Courtney J. Fung, “What Explains China’s Deployment to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6, No.3, 2016, pp. 409-441.

时代就具备与包括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的外交传统,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这项原则与“万隆精神”是一致的。^① 现今,该传统有助于中国规避遭受大国沙文主义的质疑,而大国沙文主义正是前欧洲殖民国家所普遍遭受的诟病。

中国的维和行动政策中仍然保留很多“发展中大国”的思维模式,这也让中国能够有别于其他同样积极参与维和行动的国家。然而,考虑到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已经越发趋近于传统大国地位,所以,如果中国继续坚持自身的中等国家地位,那么,在今后的维和行动中,现有的这种伙伴关系模式或将难以为继。随着中国不断通过联合国框架下的各类和平行动来推进其发展和介入政策,更多挑战也将接踵而至。

四、中国提供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模式？

目前,中国参与或可能参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多在东亚地区外,而这些行动将给中国带来更多考验。2013 年,《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声明,“中国认真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支持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②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指出,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 8000 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中国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 1 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中国将积极考虑并响应联合国要求,派更多工程、运输、医疗人员参与维和行动。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晤时再次强调,中方将不断加强与联合国在维和领域的合作,并深化在反恐、禁毒等方面的合作。^③

^① Cao Desheng, “‘Bandung Spirit’ Lives on after 50 Years,” *China Daily*, April 19, 2005.

^② “The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f China’s Armed Forces,”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16, 2013, http://www.china.org.cn/government/whitepaper/2013-04/16/content_28556977.htm, 2017-05-15.

^③ Michael Martina and David Brunnstrom, “China’s Xi Says to Commit 8,000 Troops for UN Peacekeeping Force,” *Reuters*, September 28, 2015; “China, UN to Enhance Cooperation in Peacekeeping,” *Shanghai Daily*, May 14, 2017; Meng Shixiao, “China, UN Work on Building Peacekeeping Standby Force,” *Xinhua*, June 24, 2016.

中国开始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维和行动,许多维和行动已经开始逐渐扩展至更为复杂和危险的任务区,这也意味着更多的中国的维和人员被分派到相对危险地区。鉴于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更愿意部署作战部队以配合工兵、医疗和民事警察等支援部队来完成任务。^①在马里的维和任务就是这一典型体现,2012年1月,马里爆发内战,国内冲突随着国外恐怖分子组织(包括一些忠于基地组织的成员及伊斯兰国的势力)的介入而不断恶化,同时,马里还存在来自利比亚内战的大量走私军火,形势极为复杂。^②2013年4月,中国同意派遣部队参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MA)的维和任务,中国是支援马里维和任务为数不多的联合国成员之一。2016年5月,中国的一名维和工兵战士申亮亮,在马里加奥的营地遭遇袭击时牺牲,另有四名中国维和人员受伤。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严厉谴责这一袭击事件,并承诺将采取措施保护中国在马里的维和人员。然而,马里的危险局势不仅仅威胁到中国的维和官兵,同样威胁着中国的普通民众。2015年11月,有三名中国公民在马里首都巴马科酒店袭击事故中遇难。^③

2016年7月,南苏丹国内的安全形势开始恶化,中国的两名维和人员下士李磊和中士杨树鹏在一次炮弹袭击中牺牲。2015年8月,在中方调解下,南苏丹的冲突双方已经签订停火协议。^④诚如《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所评述的,“维和行动已经进入难以预测的深水区”。^⑤近年来,维持和平与强制和平间的界限越发模糊,维和部队接触的对象已不仅是国家武装力量,还包括国际恐怖组

① Rosemary Foot, “‘Doing Some Things’ in the Xi Jinping Era; the United Nations as China’s Venue of Cho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0, No.5, 2014, p. 1092.

② Charlie English, *The Book Smugglers of Timbuktu: The Quest for This Storied City and the Race to Save Its Treasures*, London: William Collins, 2017, pp. 12-19; Greégory Chauzal and Thibault van Damme, “The Roots of Mali’s Conflict; Moving Beyond the 2012 Crisis,” *Clingendael, CRU Report*, March 2015, http://www.clingendael.nl/sites/default/files/The_roots_of_Malis_conflict.pdf, 2017-06-15.

③ Shannon Tiezzi, “Chinese Peacekeeper Killed in Mali Attack,” *The Diplomat*, June 2,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6/chinese-peacekeeper-killed-in-mali-attack/>, 2017-05-15; Mo Jingxi, “Protection Plea Made after Attack on Mali Peacekeepers,” *China Daily*, June 3, 2016.

④ Zhuang Pinghui, “Two Chinese UN Peacekeepers Killed, Two Seriously Injured in Attack in South Suda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11, 2016; “UN Honors Fallen Peacekeepers with Wreath-laying Ceremony,” *Xinhua*, May 25, 2017,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7-05/25/c_136313058.htm, 2017-05-15.

⑤ Zhou Bo, “Braving the Growing Challenges of UN Peacekeeping,” *China Daily*, November 19, 2016.

织在内的一些非国家行为体,这些新趋势对中国和其他参与维和的国家来说,无疑不是巨大挑战。

另一个问题则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在 2017 年的国家预算中将削减对外援助金额,这其中或将包括对联合国和维和行动的支持。^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同意在 2016 年至 2018 年间,增加其联合国维和摊款比额,从 6.6% 增至 10.2%,^②此外,中国还承诺为自身和其他国家的维和人员提供更多培训项目。

随着进一步崛起,中国将履行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将不断试图在自身的安全考量与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间保持平衡。中国将通过联合国维和战略来展示自身的实力与自信,同样,中国会通过发展、管理自身的软实力,乃至借助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机制,将自身塑造成联合国维和行动,甚至强制和平行动中的一个重要伙伴。那么,人们不禁会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中国不断深化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是否会提供一种新型维和模式?

(程子龙 译 董钰婷 校)

^① John Campbell, "President Trump's 'Skinny Budget' and Peacekeepin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7 March 2017, <https://www.cfr.org/blog/president-trumps-skinny-budget-and-peacekeeping>, 2017-05-15.

^② "China to Become 2nd Largest Contributor to UN Peacekeeping Budget," *China Daily*, May 30, 2016,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world/2016-05/30/content_25536341.htm, 2017-05-15.